

## 《塞福列碑》语史置疑

洪勇明

(新疆大学 语言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8)

**摘要:**在转写和翻译《塞福列碑》的基础上,利用语言学知识和历史文献,对该碑的建立时间、建立人物、立碑目的进行探讨,以期反映漠北回纥汗国在河西和西域地区的活动。

**关键词:**塞福列碑;语言;历史;对勘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10)03—0043—07

《塞福列碑》是20世纪40年代末在蒙古国南部戈壁省塞福列苏木东南6公里处发现的。碑身破损严重,碑文模糊不清,碑面对称刻写有粟特文和古代突厥文各7行。对此碑进行研究的主要有 Kljaštornyj、Livšic、護雅夫、耿世民、吉田豐、森安孝夫、片山章雄等<sup>[1]</sup>。此碑的价值在于:它是回纥汗国重要的双语纪念碑,反映出回纥与其他民族间的关系。该碑为谁而立、立碑时间、立碑目的、碑中人物关系等是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疑难问题。本文拟以语言学知识为基础,结合汉文史料和文献释读,对涉及该碑的难题进行初步阐释。

### 一、立碑人

古突厥文的第五、六、七行提到一些专有名词:kü-tar、nal、qutlu、iñi、yaγlaya;粟特文的第一、二行则提到 yaghl、inal-tarqan。其中,古突厥文 yaγlaya 和粟特文 yaghl 应是药罗葛,该部族是回纥九姓部落之一,也是可汗之姓。《旧唐书·回纥传》:本九姓部落,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sup>[2]</sup>。《苏吉碑》第一句:uyγur yirntä yγlqr qn ta/ä kltn (我从回纥之地,为追逐药罗葛汗而来)。森安氏根据吉田氏的粟特文转写认为:yγl 后面的元音是 i。若依据该氏的意见,则无法解释。依据粟特文中的 inal,可以补出古突厥文中 nal 应为 inal。因 a/ä、i/i 在书写形式上没有区别,此处 inal 抑或是 inäl。inal 与其后的 tar-

qan 都是回纥汗国的官号,如:《Mahnâmag》的官名中就有 inal、《铁尔痕碑》中有 bilgä qutluγ tarqan säñün。qutluγ 则是常见的尊号,多用于可汗名。如:alp qutluγ bilgä qaγan (武义成功)、täñridä uluγ bolmıš alp qutluγ külüg bilgä qaγan (怀信)。

古突厥文中 kü-tar、iñi 颇难定性。護雅夫认为:尽管证据不是很充分,但是可以基本肯定 kü-tar (kül-tarqan) 就是康阿义屈达干。護雅夫采用 Pulleyblank 的说法,赞同 kü-tar 是粟特康国人,祖上曾在第二突厥汗国入仕,其本人也在默啜可汗时代为官<sup>[3]</sup>。此说有些不合理:1. kü(l) 和“康”无法对音。Bernhard.K 将“康”的中古音构拟为 k'aŋ,并无韵尾 l<sup>[4](P163)</sup>。而在古突厥文中,kü 的对音是“俱”或“阙”,如:《铁尔痕碑》中 tölis külüg ärän (突利施·俱录·伊然)、kül tigin (阙特勤)。2. 康阿义屈达干生于690年,742年时就投诚唐朝,755年发生安禄山叛乱,是时其已近古稀之年<sup>[5](P122)</sup>。回纥汗国碑铭何以记录一个在唐朝为官的粟特权贵?纵使为叙述康阿义屈达干在平乱中的行为,也不符合回纥汗国碑铭的撰写传统。3. 根据古代突厥文记功碑的习惯,置于 inal 之前的 kü-tar 或是尊号或是官职,不可能是名字。如:《铁尔痕碑》有两个人物 külüg oñi öz inanchu (俱录·翁伊·俄兹·伊难殊)、uluγ öc inanchu uruγu (乌鲁兹·俄兹·伊难殊·乌隆古)。依照 Kljaštornyj 的换

收稿日期:2010-03-17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鄂尔浑碑铭所见部族考略》(050180)、新疆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漠北回纥汗国碑铭考释》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洪勇明(1971—),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语言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从事古代突厥—回鹘和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

写, kü-tar(kül-tarqan)可以解释为“有名的王”或“荣耀的达干”。

由此看来,能被称为立碑人的只有 kül-tarqan、inal、qutluy 修饰的 iñi、yaɣlaya。Kljaštornyj 认为 iñi 即“英义”的音译。“英义”二字都是零声母音节,因此韵母就决定其读音。Bernhard.K 将二韵构拟为 iɛŋ(中古庚部)、ie(属中古支一部分)。高氏所称中古汉语是指《切韵》纂辑的公元 600 年左右的语言,即长安方言,它也是唐代的共通语。属中古庚部的 iɛŋ 实际是由上古 iaŋ 发展过来的,在古代突厥文、回鹘文中常用 aŋ、uŋ 译写,如 yaŋ(样子)、yuŋ(用),有时也用 i 译写,如:qi(庚)、pi(平)、laɣki(洛京)。属中古支一部分的 ie 来自上古 a 部,在古代突厥文、回鹘文中常用 i 译写,如 buši(布施)、tūtsi(弟子)<sup>[6](P204)</sup>。因此,“英义”二字的古突厥文译写形式应为:aŋi、uŋi 或 ii,不可能是 iñi。即使 iñi 真是“英义”的译写形式,从古突厥文记功碑的习惯上来讲,也是不合理的。“英义”一名是唐廷赠与漠北回纥移地健牟羽可汗或甘州回纥可汗仁美的称号,并非其自命尊号。刘义棠称:据近代所发现之突厥文回纥可汗碑文证之,回纥国内始终未曾使用唐朝所封官号,最多不过是遣使前来唐朝时用之,甚或亦未必尽然如此,或乃出自中国史官作如此称亦未可知<sup>[7](P187)</sup>。如:täŋridä bolmıs il etmis bilgä qaɣan(葛勒可汗的尊号)。

Baily 认为古突厥人名结构有三类:1. 集团名+称号;2. 集团名+个人特征;3. 称号+集团名<sup>[8](P200-203)</sup>。iñi、yaɣlaya 恰好符合第三条原则,即 iñi+yaɣlaya, iñi 是 yaɣlaya 部落可汗或权臣的称号,也是立碑人。iñi 是回纥自封的尊号或官号,不可能是唐朝赐封的“英义”。

## 二、立碑时间

关于碑的竖立时间,Kljaštornyj、護雅夫认为是 762 年,即牟羽可汗帮助唐朝讨伐史朝义叛乱,胜利返回草原时;耿世民、李国香则认为是甘州回纥可汗仁美时期,即 900—924 年。从 iñi 不是“英义”来看,上述说法都缺乏让人信服的依据。

从碑文使用古突厥文和粟特文来看,立碑时间不早于 763 年,即回纥改宗摩尼教后。根据古突厥文的中止期,可以确定立碑时间的下限是 9 世纪下半叶<sup>[9]</sup>。若要缩小这一期限,则要考虑立碑地点、回纥在立碑地区的活动、立碑人的称号或官职、摩尼教在回纥汗国的传播、《九姓回纥可汗碑》的断代、

两通双语石碑的语法特点、正字法、文字外形之间的联系等。

《塞福列碑》位于中蒙边境的嘎顺诺尔和苏吉诺尔之间,这一地区统称为额济纳河流域,亦属回纥公主城之一。如: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今额尔济纳河),唐回纥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sup>[10](P14110)</sup>。護雅夫认为额济纳河是回纥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杨圣敏也认为:从回纥牙帐于都斤山至河西走廊有一条重要的道路,即匈奴时期的龙城故道和弱水道<sup>[11](P154)</sup>。该条道路从杭爱山南下,经花门山就可到达弱水(今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泽。沿此道继续南行,就可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但是自回纥牙帐至长安的“参天可汗道”则是南下过戈壁和沙漠到达漠南边缘,经呼延谷越阴山,再南行到达长安。756 年以后回纥两次助唐平乱,就是沿这条路进入长安。由此可见,《塞福列碑》不是回纥自长安返回鄂尔浑谷地所留的,立碑时间也不可能是 762 年。

黄盛璋认为:甘州回纥是西州回纥的一支所建;薛宗正亦认为:甘州回纥是西州回纥仆固俊败走河西所建<sup>[12]</sup>。无论甘州回纥为西州回纥哪位可汗所建,这至少说明在 884 年前河西回纥各部处于流亡阶段,从属于张义潮的归义军政权,也不可能如《塞福列碑》所述有“主君回纥可汗”。甘州回纥政权的建立始于 884 年末,即 S.2589 载:据守甘州之吐蕃、退浑、龙家等十五家,共回纥和断未定,回纥二百人在甘州抄掠……(十二月)九日,甘州已无粮用,龙家率残部退入肃州。从于阗文书 Pt.2741、Ch.00269 来看,885 年,甘州回纥就陷于内乱。自此,甘州回纥就进入恢复时期,直至 902 年才又强盛起来。杨富学认为:由于吐蕃长期统治河西地区,因此吐蕃文就成为民族之间主要的交际工具<sup>[13](P18-24)</sup>。因此,倘若此碑是天睦可汗或其子仁美可汗所立,也应该使用河西通用文字汉文或吐蕃文,不可能是粟特文。Hamilton 认为其编辑整理的藏品中第 16 号回鹘文的写作时间为 934 年<sup>[14](P92-97)</sup>,故仁裕可汗时期再使用古代突厥文已无可能。Erdal 则认为:Hamilton 整理的藏经洞中的回鹘文手稿都是 9 或 10 世纪的作品<sup>[15](P251-257)</sup>。据此观点,再考虑河西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文献,可以论定该碑不是仁美可汗所立,立碑时间也不会是 884—924 年之间。

从 848 年归义军张义潮部收复瓜、沙二州开始,尽管也有西迁回纥骚扰河西,但基本未构成威胁。如 Pt.2709 载:(869 年)西迁回纥散众进犯瓜州,

张淮深击之,捕获甚众,表上朝廷。不难看出,在归义军执政的前半期里,西迁回纥诸部尚无能力攻占和统治甘州。曾经攻占甘州的回纥或是仆固俊部或是西州回纥的一支,其没有必要由甘州北进额济纳河,只会西出沙州。至于“(875年)冬,十月,……回纥还至罗川”<sup>[16](P8181)</sup>,该部回纥亦可能是前二者之一,但其尚属流亡寇边状态,不会以“回纥可汗”自居,自然也不会留下纪念碑。

840年到847年,以庞特勤为首西迁的十五部并未建立政权,直至848年庞特勤才在焉耆自称可汗。是故,此碑也非西投安西的庞特勤部所立。散居河西的回纥诸部,以及南下的乌介十三部也无可能在此建碑。从昭礼可汗(825年)开始,漠北回纥汗国就走向衰亡,832年可汗亦为部下所杀。其后的胡特勤立于乱世,基本无作为可谈。839年,他也被逼自杀。据此,可以将建碑的下限提至832年。

关于立碑人 *iḡi* 的生平,我们仅仅知道他是药罗葛部人。该名不见于汉文史料、回鹘文文书中,却出现在摩尼文《Mahrnamâg》第59行的补注里 ‘ayangiy (‘ingiy) ‘ichrâkiy。原文只有 ‘ayangiy, Müller 在转写时增添 ‘ingiy, 显然是认同二者意义相等,即 ‘ayangiy = ‘ingiy = ingi<sup>[17]</sup>。从《Mahrnamâg》题记中可知:此诗是转献给 *Ai tängriḡä chut bulmīs alp bilgä Uigur changān* 的,拥有该称号的漠北回纥汗国的可汗为保义或昭礼。《Mahrnamâg》除献给回纥可汗及其王族、大臣外,还要给 *Tschīnāntsch* 城的主人们。这些主人包括: *Tapigliḡ Sangun Vaḡschēmāch Tapmīsch Tarchan Isik Ingi Itschrāki Vanōmāch Tontarchan* 等。作为 *Tschīnāntsch* 城的重要官员, *Isik Ingi Itschrāki* 是完全有可能到达回纥公主城并建立纪念碑的。Müller 认为《Mahrnamâg》抄写于昭礼可汗后期,此说值得商榷。 *Ai tängriḡä chut bulmīs alp bilgä Uigur changān* 后还有 *Yultuzbai Tegin, Ügä Pērōz Tegin* 和 *Chasār Tegin*, 其中 *Pērōz* 即 Parker, 又写做 *Tegin oyü*, 是指盍及特勤。Müller 据此向上推,即认为 *Yultuzbai Tegin* 为信胡特勤,进而推出 *Ai tängriḡä chut bulmīs alp bilgä Uigur changān* 为昭礼可汗。然而, *Yultuzbai* 意为“繁星或星官”,与“信胡”的语源 *qut* 或 *xut* 毫无关系,二者岂能划等号<sup>[18](P142-148)?</sup> Hamilton 将 *Chasār* 比定为曷萨特勤 *xasar*<sup>[19](P149-150)</sup>, 此说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在三位特勤的排序上却不尽合理。当然,这里可能存在一个汗位推选或继承的问题。比如:乌介可汗就是昭礼可汗的弟弟,他

于841年被南下回纥十三部推举为可汗,而非继承其兄汗位。反观史实,自821年葛萨氏的崇德可汗开始,因药罗葛氏的失势,使得其他贵族都妄图染指汗位。他们拥兵自重,又各自勾引外援,这导致汗国军事实力迅速下滑。以黠戛斯为例:回纥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回纥遣宰相伐之,不胜,拏斗二十年不解<sup>[2]</sup>。更有甚者,昭礼可汗竟为其手下所害,其时汗国王室衰败可见一斑。而保义可汗时代(808—821),既是摩尼教在漠北回纥汗国的振兴时期,又是汗国力量最强盛的时期,其统治势力足以达到西州。所以, *Ai tängriḡä chut bulmīs alp bilgä Uigur changān* 最有可能是保义可汗。依据《Mahrnamâg》可知: *iḡi* 是生活在保义可汗时期的回纥权贵,其隶属于回纥王族。

尽管从8世纪开始,因贸易的关系,粟特人和回纥人的交往日益密切起来,但是粟特人在漠北回纥汗国政权中真正发挥影响当在763年以后。自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后,传播摩尼教的粟特人在回纥汗国政权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不断参与议政、出使、和亲、经商等活动。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回纥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立寺<sup>[20](P67-75)</sup>。但是摩尼教在回纥汗国的早期传播却受到信仰萨满教的保守势力的反对,顿莫贺甚至杀牟羽可汗及其二子以及“九姓胡”,禁绝摩尼教。直至806年,“是岁,回纥入贡,始以摩尼偕来,于中国置寺处之。……回纥信奉之,可汗或与议国事。”<sup>[21](P115)</sup>此后,粟特人在回纥汗国的作用逐渐强大起来,如开成初年的回纥相安允合就是粟特安国人。因为传播摩尼教的需要,粟特人将粟特文引入了漠北回纥汗国,于是出现古突厥文、粟特文并用的现象。这一时期大致是在9世纪前后,诚如格鲁塞所言:在回纥人从伊朗或伊朗外地输入了摩尼教的同时,他们同样从这一地区,大约从乌浒河外地,借用了来自古叙利亚文的索格底安那文字母;从这种字母他们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字体,回纥字体,而在这同一个第9世纪代替了鄂尔浑河流域的古来的突厥字母<sup>[22](P145)</sup>。

《九姓回纥可汗碑》也是一通双语纪念碑,它由古代突厥文、粟特文、汉文三种文字构成。程朔洛根据汉文部分断定:该碑是颉于伽思于保义可汗在位时(814)所立<sup>[23]</sup>。华涛依据吉田豊对粟特文的最新解读,并参考阿拉伯语《雅忽比历史》认为:碑文记录的史实为808—810年回纥追击葛逻禄的军事行动<sup>[24]</sup>。该碑字体是改进的粟特文佛教写本字体,其字形一

般少许挺直和有棱角。Hansen 认为:作为基础的不是撰写佛教著作的粟特文学语言,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流传极广的粟特语言地区形成的一种常用的当地语言<sup>[25](P38-80)</sup>。而 Livšic 在研究《布谷特碑》上的粟特文后认为:《塞福列碑》中粟特文与《九姓回纥可汗碑》中粟特文在外形特征上非常相似,应属后期的粟特文<sup>[26](P347-514)</sup>。吉田豊则认为《塞福列碑》第一行和喀喇巴逊碑文第一行及其碑额,还有同类文章的开头都是一样的,故《塞福列碑》、《九姓回纥可汗碑》中的粟特文字大体相同,都属于在漠北地区形成的后期粟特文。再根据书写格式一致可以判断:二碑属于同一时期,均写于保义可汗时代(808—821)。综上所述,笔者将《塞福列碑》的建立时间限定在 814 年左右。

### 三、立碑目的

如前所述, *iŋi yaylaya* 就是 *Isik Ingi Itschräki*。但是这位漠北回纥汗国的权臣,缘何于 814 年前后在额济纳河流域留下这通双语纪念碑?要解决这一疑问,必须考虑到 *iŋi yaylaya* 驻扎地 *Tschināntsch*、漠北回纥汗国在西域诸地的活动以及回纥路上的战事、回纥和吐蕃在西域以及河西的斗争、回纥与唐所设军镇的关系、回纥所建公主城以及纪念碑附近的遗迹等。

依据排名, *Isik Ingi Itschräki* 是 *Tschināntsch* 城的主要官吏。关于 *Tschināntsch* 城的具体位置, Müller 根据贾依哈尼历来的位置规定,只说其是“九姓乌古斯或回纥最东面的城市”。对 *Tschināntsch* 城, Minorsky 提出三个看法: *Qocho* (高昌) 的别名、粟特语称谓的中国城、甘州和凉州的东北部<sup>[27]</sup>。Müller 将 *Tschināntsch* 转写为 *Chinānch*, 该词显然就是“中国”,即汉族人聚居区。虽然西、伊、庭三州是唐朝汉族军民的主要汇聚地,但是汉人称该地为“高昌”,突厥人用突厥语对音 *Qocho* 称呼它。至于“中国城”一名通常是阿拉伯、波斯学者对高昌的称呼,如波斯学者加尔底吉在成书于 11 世纪的《*Zayn al-Akhbār*》就认为高昌是“中国城”。Henning 认为:从 9 世纪初开始,吐鲁番以及位于北部的山区便归附了回纥人<sup>[28](P14-18)</sup>。森安孝夫认为:公元 8 世纪末叶,回纥、吐蕃对别失八里的争夺中,回纥尽管开始时遭到失败,但是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包括吐鲁番在内的所有天山以东地区,从此以后就处在回纥势力影响之下了,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大批回纥人被黠戛斯从蒙古高原驱赶到这里以后<sup>[29](P38-41)</sup>。安部健

夫也认为:《摩尼赞美诗》反映出回纥国势的西倾<sup>[30](P160)</sup>。学界普遍认为,从保义可汗开始,回纥就大力向北庭、安西一带经营,其政治中心也逐渐西移到天山南北麓。9 世纪第二个 10 年的后期,传教士 *Yazd-āmad* 在高昌城的一个房间发现 *Marī Schād Ormizd* 创作的《*Mahrnamāg*》。他命令自己的儿子和后代继续抄写《*Mahrnamāg*》,并撰写题记。这一期间,高昌城的统治阶层主要是回纥人。尽管 *Yazd-āmad* 是高昌摩尼教区的传教士,但是在献给保义可汗的《*Mahrnamāg*》中,他不可能使用粟特语 *Chinānch* 来指称高昌,只可能使用回纥人通用的 *Qocho* 称呼高昌。

*Al biruni* 对 *Chinānch* 所标的经纬度坐标是:东经 111°20′,北纬 42°0′,该地位于今内蒙古四王子旗一带。但从同氏所标沙州东经 115°10′,北纬 40°20′;甘州东经 116°05′,北纬 39°0′;唆里迷(焉耆)东经 113°0′,北纬 43°0′来看,其所标不甚准确,姑且不作参考。然而马卫集在其旅程记录中,将 *Tschināntsch* 置于东从宁夏一带、西达额济纳这一区域却是值得重视的<sup>[31](P15)</sup>。笔者也认同马卫集的看法,认为 *Tschināntsch* 城在亚尔河(今内蒙古临河)附近,即东经 107°、北纬 41°以东地区。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该地距回纥公主城约为 570 公里、距凉州约 510 公里、距甘州约 630 公里,距喀喇巴逊约 750 公里。从此既可以南下到达长安,又可以向西到达北庭、高昌,可以称得上是军事要地。同时,亚尔河一带也是后突厥汗国的主要游牧地,在 743 年为回纥人所占领。如《铁尔痕碑》载: *qara qum ašmīš kögürdä kömür taŋda yar ögüzdä tuŋluŋ türk bodunqa* ……我在寇古尔越过黑沙,并在煤山和亚尔河(攻击)三旗突厥人<sup>[32](P213)</sup>。因为人口膨胀和强占牧场的需要,药罗葛氏在回纥建国不久,就驻牧于此。因此,这一地区完全有建城居住的可能。

其次,在 *Vašschēmāch Tapmisch Tarchan Isik Ingi Itschräki* 之前是 *Tapīrlīx Sangun*, 其中 *Sangun* 是借自于汉语“将军”。从传教士 *Yazd-āmad* 在《*Mahrnamāg*》上的题词可以看出:有关回纥汗国的官职名称,他是用摩尼文进行换写的。因此,摩尼文 *Tapīrlīx* 实际就是古突厥文 *Tapīrlīŋ*, 笔者认为 *Tapīrlīŋ* 就是汉语“天平”的音译形式。天平军创于 819 年,驻于郾州。但是,这支军队在建立不久,就可能调防至阴山一带。《资治通鉴》278 载:长兴四年

(933年)二月“凉州大将拓跋承谦及耆老上表,请以权知留后孙超为节度使,上问使者,‘超为何人?’对曰:‘张义潮在河西,朝廷以天平军二千五百入戍凉州,自黄巢之乱,凉州为党项所隔,郅人稍稍物故皆尽,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孙也’。”由此可见,天平军一直在灵州—凉州区域内驻防。由于唐代军镇采用军政合一的体制,因此天平军将军在回纥汗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Pt.1082《登里回纥可汗口谕给沙州仆射书》载:已向金匠部门提出要求,金匠们也上告天平军(then pe kun)将军,自己愿应招请,天平军将军□□□□□□□□,天平军将军也表示,假如有与往常时之工匠相同程度者,也会派到沙州来,现在的工匠徒弟也生病。要派遣来的使者估计也会迟到<sup>[33](P50)</sup>。早在回纥兴起之初,回纥就与唐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不但历代首领皆接受唐朝的封号,而且军队也受唐朝直接征调。在保义可汗时期,他“向风纳款,继好息人,代为亲邻,多入贡职”,因此和唐的友好关系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9世纪初,吐蕃不断加大对河西地区的攻掠,甚至侵略到唐朝东北方面的北部界线<sup>[34](P179)</sup>。《资治通鉴》238亦载:辛未,丰州奏吐蕃万余骑至大石谷,掠回纥入贡还国者。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侵扰,唐朝天平军和回纥汗国只得联合起来,共处一城,抵御其入侵,以保障“回纥路”和“参天可汗道”的畅通和边境的安全。

再次,亚尔河地区尽管是回纥游牧之地,但因距离关中地区不过400公里,考虑到战乱逃难、垦荒移民、驻军屯田等原因,可能有大批汉人迁徙至此。同样情形曾在河西、陇右地区普遍发生。前田氏认为:居住在河西节度史麾下的军、守捉、堡等汉兵屯田处的汉人,加上历来住在河西诸州城邑的汉人,使汉人在河西的居民结构中的地位增加了重要性。其中,开元、天宝年间,尤其是天宝时期,经治河西的汉人势力扩张最大<sup>[34](P92)</sup>。如林干所言:回纥社会的性质为奴隶制,所以才有必要俘掠和容纳大批的汉人奴隶。大历三年(768)、建中元年(780)回纥都曾南侵俘掠唐朝的兵民<sup>[35](P61)</sup>。大量的汉族移民、奴隶和驻军云集在适宜耕作的亚尔河流域,故此该地被称作“中国城”。

至于“中国城”一名是否确指某一地区,笔者表示怀疑。阿拉伯、波斯旅行家于10、11世纪来到塔里木盆地,真的将“高昌”称为“中国城”吗? A.V. Gabain认为:高昌回纥王国时代,除占统治地位的

民族(回纥)以外,高昌还存在着下列少数民族:西突厥人、粟特人、汉人、蒙古人和吐火罗人……<sup>[36](P15)</sup>在高昌出土的壁画上,也很难看到汉族人的踪影。显然,在此时将“高昌”称作“中国城”是不准确的。因此,要么是这些旅行家道听途说或讹传误记,要么是依据历史或结合过去,要么就是用“中国城”泛指汉族人口较多的一些城市。

“回纥路”在河西走廊以北回纥汗国境内,与河西走廊平行,西通伊、西州和北庭,向东则延伸到阴山南北缘直至潢水流域,与“参天可汗道”在阴山一带交汇。驻守在Chinānch的Isik Ingi Itschrāki,其主要目的是在吐蕃占据河西,阻断“丝绸之路”后,保证粟特商人利用“回纥路”进行东西方贸易;同时也维护唐朝和西域的联系,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sup>[37](P34-42)</sup>。此外,他还可以率军策应回纥公主城,协助打击吐蕃军队。如:元和八年(813),回纥发兵南下至鸞鹄泉,然后转向西,沿“回纥路”过额济纳河的公主城,到达今巴里坤草原。再沿柳谷南下越天山向西进攻西州的吐蕃<sup>[38](P269)</sup>。鸞鹄泉(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距离亚尔河的Chinānch(今内蒙古临河附近)非常近,Isik Ingi Itschrāki肯定会出兵襄助。因此,Ingi于814年左右在回纥公主城附近留下这通双语纪念碑的一个目的是炫耀武功,即:他协助可汗攻击吐蕃,并保障粟特商人的经济利益。

《塞福列碑》古突厥文中两个漫漶不清的词提示我们:建立该碑也许还另有目的。碑中第三行隐约有:…on…bul̄yaq…,前者为“十”,后者为“乱的”。on后估计有oq,即十箭突骑施部。8世纪下半叶,居住在突骑施部故地的主要部族是葛逻禄。《磨延啜碑》北面第11行即载:(约746年)uch qarluq yablaq saqin̄p tāzā bardī, qurīya on oqqa kirti 三姓葛逻禄心怀恶意地逃走了,他们在西方进入十箭(人民)的(地方)<sup>[32](P195)</sup>。《新唐书·回纥传》亦载:肃宗至德后,葛逻禄寝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sup>[2]</sup>。8世纪中期,葛逻禄和回纥结成战略同盟,推翻颉跌伊施可汗。《唐历》载:天宝三年(744年),突厥拔悉密可汗又为回纥葛逻禄等部族袭杀之,立回纥为主,是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立为奉义王,又加怀仁可汗<sup>[43](P6856)</sup>。随着迁入西突厥之地,葛逻禄的势力逐渐强盛,因此想摆脱回纥的统治。从碑文隐含的意思“在十箭故地作乱的葛逻禄”……可以推测出:当时,葛逻禄在十箭故地与吐

蕃联合起兵攻打回纥,而 Ingi 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沿回纥路西击葛逻禄。这次打击的结果如《九姓回纥可汗碑》汉文所言:第 20 行□□□□□攻伐葛禄、吐蕃,旗斩,追奔逐北,西至拔贺那国,俘获人民及其畜产。叶护为不受教令,离其土壤。第 21 行□□□□□□九姓毗伽可汗复与归顺葛禄,册真珠智慧叶护为主,又十箭三姓突骑施<sup>[23]</sup>。

由于《塞福列碑》发现地附近再无任何墓葬建筑的痕迹,这就否定了它是墓碑的推论。因此,笔者认为:《塞福列碑》是 Ingi 在征讨葛逻禄和吐蕃胜利返回 Chinānch 时留下的记功碑。

#### 注释:

本文中的古突厥文、回鹘文、摩尼文均采用转写形式或换写形式。

#### 参考文献:

[1]S.G.Kljaštornyj.Drevnetjurkskaja pis'mennost' i kul'tura narodov Central'noj Azii (po materialam polevyh issle-dovaniij v Mongolii,1968-1969)[J].Tjurkologiceskij Sbornik,1972 Moskva,1973 str.254-264;護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M].东京:山川出版社,1972.557-572;耿世民.回纥汗国时期古突厥文碑铭译文//林干.突厥与回纥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402;森安孝夫,才チル.モンゴル國現存遺跡.碑文調査研究報告[M].大阪:中央ユーテシア学研究会,1999.225-227.亦可参考蒙古国《考古文集》(1980)对该碑发现及碑文内容的介绍。

[2]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71,169,142.关于 yaylaya 一名可参见: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M].耿升,穆根来,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78.

[3]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at An Lu-shan[J]. London Oriental series,1955(4).

[4]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M].聂鸿音,译.济南:齐鲁书社,1987.

[5]Kljaštornyj.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M].李佩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

[6]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M].钟翀,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7]刘义棠.突回研究[M].台北:经世书局印行,1990.

[8]Baily.Turkish proper names in Khotanese//Z.V. Togan's Armagan[M]. Istanbul, 1954 S.

[9]关于鲁尼文(古突厥文)的中止期,Kljaštornyj 认为是 10 世纪末,见 Kljaštornyj.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M].李佩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52.马跨特则认为:在 10 世纪使用鲁尼文不大可能,见上引书同页.笔者认为马跨特的观点是正确的:首先是在蒙古和新疆没有发现九世纪中叶以前的鲁尼文文献;其次克氏所引阿保机用“契丹文、突厥文和汉文撰写碑铭”中的突厥文是指回鹘文,参见:杨富学.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J].民族语文,2005(1):61-64.

[10]王延德.西州行程[A].脱脱,等.宋史·高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杨圣敏.回纥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12]黄盛璋.敦煌于阕文 P.2741、Ch.00296、P.2790 文书疏证[J].西北民族研究,1989(2):41-71.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J].新疆大学学报,1996(4):36-40.

[13]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之文化关系[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1).

[14]Hamilton.敦煌回鹘文写本的年代[J].牛汝极,译.西域研究,1995(3).

[15]Erdal. The Uyghur Documents in Dunhuang [J]. BSOAS,1988(51).

[16]欧阳修.资治通鉴(卷 252)[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J]. APAW,1912(Nr.5):3-39. Müller 依据吐鲁番庙柱文书 IB4672 认为“回鹘在 768 年就使用回鹘文”是不可取的,见:该氏. Zwei pfahlschriften aus den Trufanfunden [J]. APAW,1915 S3-13.

[18]刘义棠.维吾尔研究[M].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87.

[19]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M].耿升,穆根来,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20]张国杰.摩尼教与回鹘[J].世界宗教研究,2000(3).

[21]冯志文,吴平凡.回鹘史编年[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

[22]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M].魏英邦,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23]程朔洛.唐宋回鹘史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4.102. 此观点与沙畹、伯希和的看法一致,见 Chavannes & Pelliot. Un traite manichaen retrouvée en chine[J]. JA, 1913 27-45.

[24]华涛.西域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3.有关该碑的粟特文研究,可参见:吉田豊.カラバルガスソ碑文のソグド語版について[J].西南アジア研究,1988(28) 24-52.

[25]Hansen. Zur soghdischen Inschrift auf dem dreisprachigen Denkmal von Karabalgasun[J].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930(44).

[26]Livšic.Xromov. Sogdijskij jazyk//Abaev. Osnovy iranskogo jazykoznanija.Sredneiranskije jazyki[M]. Moskva, 1981.

[27]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记》第94、271页.同氏《马卫集》第18页.转引自: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M].宋肃瀛,刘美崧,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162-165.

[28]Henning. Argi and Toxri[J]. BSOS, 1931(3).

[29]森安孝夫.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间夺取了别失八里?[J].罗贤佑,译.民族译丛,1982(3).

[30]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M].宋肃瀛,刘

美崧,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31]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记[M].王治来,周锡娟,译.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2.

[32]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33]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34]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M].陈俊谋,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35]林干,高自厚.回纥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36]冯佳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M].邹如山,译.吐鲁番: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

[37]陈俊谋.唐代回纥路的开通及其影响[A].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38]杨圣敏.突厥回纥史料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栏目主持:赖洪波】

【责任校对:张建国】

### The Questions of Sevrey Inscription

HONG Yong-ming

(School of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08, China)

**Abstract:** Basing the transcrip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Sevrey Inscription, with the lingual knowledge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time master and purpose of building the inscription,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activities of Uighur Khanate on Turkestan and Hosi.

**Key words:** Sevrey Inscription; Languages; History; Contrast